彭湃研究争议中的四个历史问题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 彭湃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史学界关于彭湃四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却仍有很大的意见分歧,即五四时期彭湃思想倾向的研究,建党前后彭湃思想倾向的研究,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间的研究,彭湃入党时间的研究。随着研究资料的挖掘,梳理弄清这些问题,对彭湃的研究非常必要、意义重大。

关键词: 彭湃; 五四运动; 中共"一大"; 农民运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8)04 - 0096 - 08

The Four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PENG Pai

MIAO Tijun
(Institute of Marx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PENG Pai was a famous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 of peasant movement in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He was the creator of the Soviet regime in Hailufeng, Guangdong Province.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about four historic issues related to PENG Pai in historical research circle, namely, the study of PENG's mind - se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study of PENG's mind - set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study of time when PENG began to take up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the study of time when PENG joined the CPC. With the mining of the research data, some issues have been completely clarified, which is very necessary and significant to the study of PENG Pai.

Key words: PENG Pai;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asant movement

彭湃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多年来,对于彭湃的研究在多个问题上,史学界产生过很大的意见分歧。有些问题随着研究资料的挖掘,得到了彻底的澄清,有些问题依然在争论中。本文力图梳理清楚其中四个问题,以推进对彭湃的进一步研究。

一、五四时期,彭湃思想倾向研究上,理论界存在有两种说法

1896 年 10 月 22 日,彭湃出生在广东海丰县一家集工商业、地主于一身,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人

收稿日期: 2016 - 12 - 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编号: 15YJA770014)
作者简介: 苗体君(1969 -),男,河南鹿邑人,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人物。

家。1917 年夏，彭湃赴日本留学，1918 年 9 月 30 日，彭湃考入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东京早稻田大学三年制政治经济科学习。1919 年 9 月 18 日，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成立了左翼组织“建设者同盟”，彭湃加入了该组织，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1920 年 10 月，彭湃与李春涛、杨嗣震、林孔昭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研究社会主义的“赤心社”。关于这一时期，彭湃的思想倾向，理论界存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彭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与在日本的进步留学生组织了“赤心社”，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的彭湃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而且“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1](P9)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五四运动前后，澎湃“还是一个要求祖国独立富强、人民自由平等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P18)“在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彭湃‘深信’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即使在这个时期前后，彭湃还同一些留日的中国学生组织了‘赤心社’，研究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问题，然而也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赤心社’能够改变彭湃在这段期间总的思想倾向”。[1](P19)

事实上，这时期彭湃的思想是杂乱无章的，不具有只有一种倾向的可能。他的思想中有热烈的排日爱国思想，又信仰基督教博爱思想，还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也有着较深刻的研究，所以说用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表述当时彭湃的思想倾向，都是不准确的，不全面的。

从 1917 年夏到 1919 年暑假的两年里，彭湃一直醉心、痴迷于基督教的研究。李春涛也是留日学生，关于彭湃在 1917 年至 1918 年期间思想的变化，李春涛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中说‘彭湃当 1917 年初到东京留学时，还是一位褊狭的爱国主义者。他眼见日本人褊狭的爱国狂，亦就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他自有了这种见解，一直到 1918 年年末，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然而不久，彭湃竟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2](P30) 但也有资料显示，彭湃刚刚到日本时，曾经一度研究、信仰基督教，并试图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寻找救国之路。彭湃的弟弟彭泽也在日本留学，彭泽在《往事的回忆》中说，彭湃“初到日本时，他寄宿于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国留学生所设立之宿舍，也曾受基督教影响”。[3](P689)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陈卓凡回忆说‘我在 1919 年到日本留学时，彭湃同志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当时我在东京和他同住一家公寓叫‘松叶馆’，同住的还有中国留学生李春涛、杨嗣震、林泉、彭泽等。这一年的暑假期间，彭湃与杨嗣震（也是信奉基督教）在每天饭后研究圣经，并约我参加。我因不信教，为避免他们来麻烦，所以吃午饭后即回房间午睡，可是彭湃同志很耐心地来劝我参加。我表示没有兴趣。他说‘你未入门，所以无兴趣。’我坚持不去。他还是说‘20 分钟好了’、‘10 分钟好了’等等，说服我参加研究。”[3](P693)

1919 年 9 月 18 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彭湃加入这个组织，不久又单独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据李春涛回忆，“及至一九一九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又大受影响。且鉴于向所信仰的基督教之不彻底，及基督教徒之堕落，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与一二友人同入早大学生所组织之建设者同盟，研究劳动运动诸派别及其学说；且单独加入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坂（坡）。至是，彭湃遂始渐成为一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建设者同盟改组为晓民会；会中人物，如高津正道等，皆在从事实际运动。彭湃数与往来，因与大杉荣、堺利彦、近藤荣藏等相识”。[4](P283) 陆精治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彭湃时说“1919 年 9 月，早大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彭湃便加入了这个组织，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和思想较为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不久，他又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经常帮助劳动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彭湃开始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者堺利彦、大杉荣等有过接触和交往。堺利彦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译过《共产党宣言》，大杉荣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译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日本较有声望，在青年中更有影响。我们在一起度过休息日时，彭湃就给我们断断续续地介绍堺利彦、大杉荣等人的一些事情。每当这时候，他的神色庄重、虔诚，语气中还带着崇拜

的成分。”[3](P711)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确切地说,从 1919 年 9 月开始,到 1920 年 8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期间,彭湃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特别是 1920 年初,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曾阅读《互助论》《面包略取》等书。

1920 年 10 月,彭湃、李春涛等在东京“松叶馆”的中国留日学生中倡议组织“赤心社”,以表达他们要“一心学俄国”的愿望。据赤心社成员李孝则回忆,“赤心社不定期的举行学习会,讨论过十月革命,学习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河上肇的《社会主义研究》”。[5](P149) 赤心社成员陈卓凡也曾回忆说:“这个组织是属于研究性质的,如对阅读的社会主义书籍有疑问时相互提问,互相研究,并共同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传达及研究日本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况等。1921 年 5 月间,彭湃先回国,任海丰县教育局长,随后李春涛、杨嗣震也相继到海丰工作。这时赤心社的中心实际上已从东京移到海丰。”[3](P695) 可以说,这些材料只能说明这期间的彭湃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学说,但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彭湃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

二、建党前后,彭湃思想倾向研究上,理论界存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彭湃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信仰”但还不是“深信”,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仍然存在。另一种说法认为,1921 年 5 月到 1922 年 6 月,是彭湃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当时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开展了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开始树立优势,先进的知识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彭湃也受到深刻影响,思想上逐步起了质的变化,“由过去仅仅是学习、研究,转变为开始‘发生信仰’”。[1](P20) 终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让我们分析一下,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1921 年三四月间,旅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施存统曾与彭湃谈过一次话。据施存统回忆,当时彭湃“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强调农民运动,对工人运动似乎重视不够。据我所知,他对农民的运动的重视比我们任何人都早。他对党是表示支持的,但跟党的意见不完全一致”。[3](P714) 同年 5 月初,彭湃考完毕业考试后即离开日本回国。

1921 年六七月间彭湃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不到 3 个月,成员发展至 70 多人,成员大多是海丰中学的先进学生、小学教师和在省城广州读书回乡度假的学生。成员陈其英在《彭湃在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中回忆说“社会主义研究社自成立到停止活动不到三个月。期间,共举行座谈会十二次,专题讲话四次,对外宣传三次。……专题讲话,由彭湃主讲,共讲:河上肇博士社会问题管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等。对外宣传:第一次是在溪西杂货街陈氏宗祠——绵德堂,主要对象为工人和一般居民。……彭湃讲世界职工运动发展形势,这些人都听得很注意。对外宣传的第二、三次均在溪西社灵爷宫前(番薯市场),主要对象为农民。彭湃就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两个专题均加以深入浅出的讲述。……彭湃所讲的是他们从来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因此传开出去,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5](P153-154)

1921 年 9 月 1 日,彭湃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告同胞》是彭湃从日本回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政治宣言书,是反映这一时期彭湃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著作,理论界在研究这篇文章时,产生了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彭湃在留学日本时,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告同胞》虽在某些问题上尚存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但其基本思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革命,鼓动人民起来破坏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是一篇向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宣战的战斗檄文,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著作。“如果只抓住《告同胞》书中某些现在看来不很恰当的具体说法,就轻易认定早期的彭湃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事实根据是不足的,也是不够科学的。”[2](P51)

第二种说法认为,《告同胞》开宗明义提出“我们近日的时代,即是世界有史以来未曾经验的一大破坏时代”![6](P3) 主张破坏法律、政府、国家和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

原则，具有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没有提出“暂时”还要“国家”“政府”“法律”的过渡时期，而且抽象地提倡通过“互助”来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告同胞》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无政府主义。日本学者容应萸认为，彭湃的《告同胞》“这篇文章提出的显然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工联主义的观点”。[2](P53)

第三种说法认为，《告同胞》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论证了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尖锐地批驳了污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均富分财”“提倡公妻”的谬论，捍卫了社会主义学说，正确地提出了革命要依靠多数人的思想，号召人民联合起来参加革命。但是《告同胞》确实存在着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主要表现有，认为国家的存在是战争、侵略的根源，反对一切法律，反对一切政府，反对一切国家。幻想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因此《告同胞》既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又掺杂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观点。这是彭湃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阶段的思想反映。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告同胞》代表了彭湃建党前后思想的倾向性，不言而喻，通过对《告同胞》一文逐字逐句的分析可以看出，《告同胞》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观点。可以说，建党前后的彭湃已经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有较为深刻信仰，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仍然存在。

三、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间的两种说法

关于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彭湃的著作《海丰农民运动》一文，彭湃说“一九二一年五月间我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五月某日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进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7](P145－147) 从彭湃的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是 1921 年 5 月。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彭湃领导农民运动的时间应该是 1922 年。

1921 年 5 月说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文在文字记述中存在时间上的错误，突出表现为以下四点：(1) 查阅《彭湃年谱》，可以肯定地说，1921 年 5 月 23 日以前，彭湃还在日本的东京。1921 年三四月间，旅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施存统曾与彭湃谈过一次话，施存统在《和彭湃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彭湃在 1921 年 5 月回国之前(约三四月间)，我代表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作过一次长谈。”[3](P714) 1921 年 4 月，彭湃得知祖母患病的消息，便赶写毕业论文，准备回国。同年 5 月初，彭湃考完毕业考试后，离开日本回国，5 月 23 日，彭湃回到海丰参加其祖母的葬礼。对此，彭湃的好友陈其英在《彭湃在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一文中回忆说“一九二一年四月底和五月初，彭湃正在准备早稻田大学毕业论文时，得到祖母患病的消息，赶紧写论文，论文完成后，未参加毕业仪式和毕业旅行参观，就匆匆赶了回来。彭湃抵家时，祖母苏老太夫人已于数日前逝世，入殓后停棺待葬，他未得送终，引为遗憾。于是，他就灵前用墨笔追绘遗像，栩栩如生，以寄托哀思。”[5](P152) 可见，彭湃从日本回到家中的准确时间是 5 月 23 日，接着便忙于料理丧事，痛失祖母的彭湃不可能在 5 月 24－31 日间还抽时间去搞农民运动，这也根本不符合常理。

(2) 彭湃担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的时间也不是“一九二一年五月间”。[7](P145) 1921 年 8 月 9 日，海丰劝学所长陈伯华因贪污腐化，在学生的强烈反对下，被迫辞职。同年 8 月 12 日，海丰学生联合总会代表到县署请愿，要求任命彭湃为劝学所长。县长翁桂清以一切事物都听命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由，要学联会向陈炯明建议。8 月中旬，彭湃和海丰学生联合总会代表郑志云、陈魁亚等前往广州，在广州期间，彭湃曾拜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9 月底，彭湃回到海丰。1921 年“10 月 1 日，陈炯明指令海丰县长翁桂清委任彭湃为县劝学所长”。[2](P53) 1922 年“1 月 3 日，海丰县劝学所改为教育

局,彭湃任局长"。[2](P61) 而且彭湃的教育局局长也不是 1921 年 5 月"遂致被其撤差"[7](P146) 的,彭湃是 1922 年"5 月 9 日,被免去教育局长的职务"[2](P64) 的。

(3) 说彭湃 1921 年 5 月"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7](P146) 经查《陆安日报》是 1921 年 8 月 3 日创刊的,彭湃不可能在 1921 年 5 月就与《陆安日报》展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由此推断彭湃开始从事农运不可能在 1921 年 5 月。

(4) 1921 年 9 月,由海丰学生联合会出版的进步刊物《新海丰》创刊,同年 11 月《新海丰》出版第二期,如果彭湃从 1921 年 5 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话,《新海丰》对此应该有所介绍,而在出版的《新海丰》创刊号及第二期,共登载 60 多篇稿件,竟然无一处提到海丰农民运动发展的情况。

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到底是何时?查阅郭德宏编著的《彭湃年谱》,彭湃是 1922 年"6 月下旬,深入农村,开始从事农民运动"。[2](P74) 蔡洛、余炎光、刘林松、罗可群著《彭湃传》所附彭湃生平年表中,也说彭湃 1922 年"6 月下旬,深入农村,开展从事农民运动"。[8](P235) 彭湃创建的海丰县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李思贤就是 6 人农会中的一员。1978 年 5 月 3 日,李思贤回忆"六人农会"时说"彭湃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创始人。1922 年 6 月,他深入到海丰城郊的赤山约村子里,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P140) 从现今发现的各种史料来看,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应该是 1922 年 6 月。

四、彭湃入党时间的四种说法

关于彭湃入党时间的问题,目前存在四种不同说法,但迄今为止仍未能找到原始档案材料,以便于考证核实。

1. 1921 年入党说。持这一说法的资料有多个,而且可信度最大。

①1936 年,在延安毛泽东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谈话时说,1921 年 10 月,"湖南成立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我是成员之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组织……广州有林伯渠(林祖涵),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还有彭湃(1929 年被害)"。[9](P117-118) 查阅郭德宏编著的《彭湃年谱》,1921 年 8 月中旬,彭湃到广州,"住在广东省议会。在广州期间,彭湃曾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2](P49) 而且那个时候入党没有太多的程序,打个招呼,说一声就是了,周恩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就是先与介绍人张申府谈个话,张申府"写信向陈独秀报告"[10](P649) 就行了。而彭湃是直接见到了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面对彭湃这样有抱负的热血青年,陈独秀岂能错过,所以,彭湃 1921 年 10 月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且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彭湃的入党情况应该有所了解。

②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之一、旅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1956 年 12 月,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1921 年 7 月以后,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有彭湃同志,还有一个好像叫杨嗣震,其余的名字已忘。该小组由我负责,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11](P34) 经查证,彭湃是 1921 年 5 月 23 日从日本回到海丰参加其祖母的葬礼的,1921 年 7 月彭湃根本就不在日本。而且 1921 年约三四月间,施存统曾作为旅日中国共产党小组负责人与彭湃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谈过一次话,施存统明确记录,彭湃"当时还没有加入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11](P34) 而且"彭湃在 1921 年 5 月回国之前"[11](P34) 进行的谈话。这可能是施存统误把彭湃这个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作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的缘故。

③1946 年,胡希明在香港主办《星期报》,当时,要在《星期报》上连续刊登《彭湃烈士传略》,关于彭湃同志入党的时间问题一时弄不清,胡希明就去香港铜锣湾金龙台请教谭平山,谭平山是中共创建前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小组的负责人,对中国共产党广东小组每个党员的情况非常熟悉。谭平山对胡希明说:"彭湃同志是于 1921 年由我介绍入党的。"[12](P68) 1980 年 3 月 12 日,胡希明回忆采访当年谭平山的经过时,特别强调"这是谭平山同志亲自跟我讲的。在场的谭平山同志的爱人孙荪荃也亲自听到"。[12](P68) 这应该是最为可信的。

④1932 年,刚刚被解职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用俄文为《红色海丰》一书写序言,说“彭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党,是广州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广州的无产者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不久,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丰,从此便将自己的一切完全贡献给了农民运动”。[13](P850) 瞿秋白接着又写道“陈公博尽管也是广州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但他不久就脱离工作了。至于谭平山,他担任领导时没有给农民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只有彭湃,即是党的组织者,同时又是农民运动的组织者。”[13](P850) 瞿秋白这两段话更加充分地印证了,1921 年 8 月彭湃在广州拜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实,而且瞿秋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这段话是可以相信的。

⑤1959 年,革命圣地海丰红宫旧址进行文物陈列,在展出“彭湃同志史略”时,遇到彭湃入党时间的问题。于是,就由颜永年起草一份公函,寄给中共中央组织部。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复函写道“关于彭湃同志的入党问题,彭湃同志的原始档案,直至今在中国尚未发现,根据苏联国立列宁格勒档案馆所珍藏的档案资料称:彭湃同志是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P69) 彭湃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中共中央组织部决不会轻易、随便地为彭湃的入党时间下结论的,其必然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才给出结论的,我们要相信中组部给出的这一结论。

⑥谭天度,广东高明人,与谭平山、谭植棠一起被称为著名的“三谭”,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小组的成员之一。1920 年 10 月,“参与谭平山、谭植棠等创办的《广东群报》,负责组稿和征订等工作”。[14](P477) 同年 12 月,陈独秀到达广州,与谭天度接触较多。1922 年春,谭天度“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4](P478) 谭天度对中国共产党广东早期组织比较了解,关于彭湃入党时间的问题,据谭天度 1964 年、1973 年、1980 年回忆“彭湃同志约在 1921 年春夏之间到广州见陈独秀。他一方面接受省教育委员会的任命,充当海丰县教育局长;另方面研究有关开展革命运动等问题。大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党的。我入党时,彭湃已在支部参加开会。”[14](P226) 谭天度在《回忆广东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也说“大约在 1920 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在其存在时期间所做的工作,据我所知有如下几个方面:……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中,尤其可贵的是,已经有一些同志开始到工农群众中去……这里略举出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还在 1921 年间,彭湃同志就已经深入到海丰县的农村。”[14](P267-268)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彭湃是广东共产主义的早期成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早期组织的成员。

1979 年 9 月,《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四期刊载谭天度的回忆文章,文章说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三人,以后到 1921 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彭湃等”。[12](P69) 可见,依据谭天度的回忆,彭湃的确是 1921 年入党的,这是确定无疑的。

2. 1922 年入党说。持这一说法的资料仅有一条,所以可信度近乎为零。

萧三,萧子升之弟,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曾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是同学,萧三曾经和哥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著名的“新民学会”。1962 年 5 月,萧三在其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说“彭湃(1896-1929 年)广东海丰人。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P69-70) 也不知道萧三说彭湃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依据是什么?迄今为止,也只有此处说彭湃是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就成了孤证,所以此说的可信度近乎为零。

3. 1923 年入党说。持这一说法的资料有两条,现在发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①1979 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研究资料》第 11 期,刊发了广东党史研究者、曾与蔡洛等人合著过《彭湃传》的刘林松撰写的《彭湃烈士入党时间问题的商榷》一文,文章中说“彭湃同志入党的时间,在 1923 年 10 月。”[12](P70)

刘松林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1923 年 9 月 7 日,彭湃以何海为笔名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文亮(即施存统)写信,说明自己不能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还有 1923 年 7

月 26 日、8 月 5 日,海陆丰地区两次遭强台风袭击,彭湃原计划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议一些事情,因领导抢救台风造成的灾害,彭湃取消了广州之行,彭湃召集农民开会,讨论减租问题,并决定三成交租为最高限度,接着就遭到县长及豪绅的反对。8 月 16 日,县署派军警镇压,并抓走农会职员 25 人,彭湃遭到通缉,这就是所谓的"七五农潮"。此后农会转为地下斗争,彭湃被迫出逃,并秘密前往各地营救被俘农友,彭湃借此信谈自己思想的转变,信中说"我现在仍然是继续的奋斗!请安心!""经这回的变动,同志间有几个变节了。我们的分子坚实些了。"接着彭湃感慨地写道"我以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的。口口(此处有两字原件难以辨认,现暂缺)的共产党人我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即马克思主义—引者注)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6](P41-43) 不知以何为依据,刘林松以彭湃的这封信竟然推断出,1923 年 9 月 7 日前,也就是彭湃写这封信前,彭湃还没有入党。

关于彭湃入党的时间,刘林松认为是 1923 年 10 月,并认为彭湃于 1921 年 5 月从日本留学回到海丰县,随后赴广州,并在广州待了两个多月,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彭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七五农潮"失败后,同年 9 月,彭湃赴广州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彭湃当时是以鹤山区代表的身份参会的,就是在参会期间彭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实,以鹤山区代表的身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彭湃,是另外一个人,他的真名叫彭刚侠,不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海丰的彭湃,很显然刘松林把鹤山的彭湃误认为是海丰的彭湃,才出现了海丰的彭湃 1923 年 10 月入党的错误。为了谨慎起见,后来仔细查下来,彭湃从 1923 年 8 月 16 日,"七五农潮"失败,遭通缉后,一直在积极参与领导营救被捕农友的活动,直到 1924 年 4 月上旬,彭湃才"抵达广州,住越秀南路 93 号(现为 53 号)"。[2](P185) 可以确切地说从 1923 年 8 月 16 日至 1924 年 3 月间,彭湃没有去过广州。1923 年 10 月 28 日,当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两广区委书记的阮啸仙《给团中央的七个报告》中说"海丰地方在战事区域内,闻彭湃同志逃往汕头,消息不通。"[15](P96) 这句话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及会议期间,彭湃都不在广州。

②1981 年 5 月 20 日《羊城晚报》刊载了广东党史专家黄振位撰写的《广东革命史上有两位彭湃》一文,文中写到"海丰的彭湃,在我党历史上,是众所周知的。他于 1896 年 10 月 22 日诞生于海丰县桥东社,乳名天泉,学名汉育。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P70) 黄振位撰写文章时,可能是接受了刘松林的研究成果。

4. 1924 年入党说。持这一说法的资料有多个,但经不起推敲,不可信。

①193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 16 号刊载了《彭湃杨殷两同志事略》一文,文中写到"1923 年 1 月海丰县农会成立,会员有 2 万户,群众 10 万人,彭湃同志当选为正会长,不久,广东省农会成立,当选为省农会的执行委员长。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P70)

②曾在中共广东区委农委担任领导工作的罗绮园,1930 年 8 月 30 日,在《北方红旗》第 29 期,以笔名易元发表了《彭湃同志传略》一文,文章中说"彭湃同志加入共产党是 1924 年,在未加入之前,他在海丰已先有贫民党的组织,自从海丰农会被陈炯明解散,他只身到广州始介绍入党,时值国民党改组,设农民部,任彭湃为农民部秘书。"[13](P844)

③林务农曾经担任彭湃组织的广东省农会宣传部部员,并曾任海陆丰团地委书记,1989 年 8 月 15 日,林务农在《回忆海陆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经过概况》一文中说,彭湃"是 1921 年在上海加入了团,再返回海陆丰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以后,于 1924 年回到广州时才转为正式党员的"。[12](P165)

④陈卓凡是彭湃留学日本时的同学,也是彭湃创办的赤心社的成员,陈卓凡在《关于彭湃同志留日时的忆述》一文中写道"1924 年,海丰农会第二次被取消后,……彭湃同志到了香港后,曾写过一封信给我们,其中有'我到香港后,在大公司门口徘徊了几天,现在已进入大公司了。'当时我和林孔昭接信后,估计他是入了党。据说当时党中央谭平山同志派黎樾廷等到香港欢迎他到广州。他是由谭平山介

绍入党的。”[12](P47) 1982 年，蔡洛、余炎光、刘松林、罗可群撰写《彭湃传》时，采用了陈卓凡的《关于彭湃同志留日时的忆述》一文中说法，说 1924 年“四月上旬，彭湃抵达广州。在这里，他以社会主义青年团身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P88) 2007 年 9 月，郭德宏编著的《彭湃年谱》也采用了这一说法，说彭湃 1924 年 4 月上旬抵达广州，“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2](P185)

其实，关于彭湃 1924 年入党说是最不可信的。随便翻开一本与中国国民党“一大”有关的书刊，你都会看到，1924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开幕，彭湃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在香港、汕头等地，没有来广州出席会议，大会历时 10 天，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 年“2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党部，谭平山被选为中央常委委员和组织部长，林祖涵被选为农民部长，共产党员杨匏安、彭湃、冯菊坡、张善铭，分别担任组织部、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秘书”。[16](P90) 这段话已十分明确地表明，1924 年 2 月 1 日前，彭湃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彭湃 1924 年 4 月上旬抵达广州，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之说。至于陈卓凡在《关于彭湃同志留日时的忆述》一文中说到的，国民党“一大”后，当时彭湃因农运失败流亡在香港，“党中央谭平山同志派黎樾廷等到香港欢迎”。[12](P47) 彭湃到广州的原因是，在国民党“一大”上，谭平山刚刚被选为中央常委委员、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就非常有必要把已是共产党党员，且有着丰富农民运动经验的彭湃迎回广州，在农民部担任要职，以发挥其擅长农民运动的专长。

参考文献：

[1] 叶佐能. 彭湃研究论集(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2] 郭德宏. 彭湃年谱[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3] 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 不朽的丰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 彭湃研究史料编辑组. 彭湃研究史料[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5] 刘林松，蔡　洛. 回忆彭湃[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 彭　湃. 彭湃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蔡　洛，余炎光，刘林松，罗可群. 彭湃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美〕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10] 张申府.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A].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 施存统.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A].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 叶佐能. 彭湃研究史料(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13] 叶佐能. 彭湃研究史料(下)[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14]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谭天度纪念文集[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5] 阮啸仙. 阮啸仙文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郭荣华)